

总是纠结在一起。说它偶然,乃是因为它的产生的最初促动,就是由于那么几个延安文人和几篇作品引发的。一个重要的文人就是鲁迅的弟子萧军。萧军在延安时期曾经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关爱,但是他跟周扬等人的矛盾又是那样不可调和,而当萧军等人的自由批评权利受到周扬等人的压抑时,他就在毛泽东面前提出了中共中央有无文艺政策、应该制定文艺政策的话题。毛泽东坦率地说,整天忙着打仗,哪有什么文艺政策,但是他对文艺政策的制定当即表现了极大兴趣,进而挽留萧军等人为他收集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周扬曾经提到延安作家有“鲁艺”和“文抗”两派,前者主张歌颂,后者主张暴露。丁玲对此做过严厉反驳和否定,其实否定并不符合历史实情,延安文人中的派性和矛盾是自然存在的,萧军和周扬的矛盾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当然丁玲不是周扬所言文抗派的首领。再者,文艺座谈会之前,丁玲、王实味等人集中发表的《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等一系列批评尖锐的杂文,还有那些讽刺性的漫画和吸引人们目光的“轻骑队”之类的墙报,尽管初衷都是为了帮助延安整风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也并非有违延安整风的旨意,但其在延安高级干部中所引发的不良反响,也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忧虑。这些并不令人愉快的文化现象的发生,对毛泽东有关文艺政策的关注和思考,应该说或多或少都有些触动,也有些偶然的吧。《讲话》的产生有其偶然性,但更多是必然,有其不可移易的历史逻辑性,它在毛泽东的政治文化建构和意识形态权威的形塑上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讲话》之前,其实延安并非没有党的文艺和文化政策,延安当时的文化政策还是非常契合文化创造的自由天性的,但是这个文化和文艺政策更多打上了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张闻天的思想烙印,在毛泽东看来是有些自由主义的,是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不太一致的,因而它的有在本质上就是无。理解《讲话》的产生,这也是个大的思想和历史背景。

思想逻辑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历史的逻辑走向,历史本来可能是无逻辑可言的,但因为人尤其是强势话语者的介入,也就具有可供理解的几分逻辑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延安整风运动为何会向延安文艺、文化和延安文人方面延伸。历史是需要用宽容之心去加以理解的,因为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存在,而对复杂之真的打捞,往往需要一

种淡定、悠闲和包容的胸怀,在历史研究中泄私愤或充当愤青至多只是一种杂文家的心态,这是求得历史真相的大忌。《讲话》乃是一个关乎政治文化和文艺政策的文本,而不是仅仅基于毛泽东个人艺术和文化天性的理论思想文本。《讲话》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语境,它的价值首先体现在政策方面而不是理论方面,毛泽东倡导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主要不是对于文艺问题的理论研究感兴趣,他要解决的是对文艺政策的引导和制定。因此,把《讲话》首先理解为一个带有超越时空的文艺理论文本,正是当时和后来不少宣传者、研究者或许别有用心或许无所用心的偏执,是一厢情愿,更是对《讲话》边界的越位和误读。

不仅《讲话》的产生是基于重新制定党的文艺政策的考量,它的发表和传播最初也是作为一个党的文艺乃至文化政策来定位的。文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存在,这对于深谙古典诗词创作的毛泽东来说,乃是不言自明的,所以,他对《讲话》的发表不能不说非常慎重。¹

